

数字经济、财务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财务理论前沿 2022 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吴武清¹ 闫丽娟² 傅雪君¹ 刘梦娇²

(1.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

2.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有助于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权。2022年12月8日,由中国财政杂志社《财务研究》编辑部 and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教育部财务管理课程虚拟教研室和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参与协办的“财务理论前沿 2022 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办。大会分为主题报告和论文研讨两个环节。与会代表围绕“数字经济、财务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以数字化为支撑,加快构建中国式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务研究》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杨敏指出,主办高水平学术期刊,推动高质量财务理论研究,要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关注会计服务高质量发展涉及到的重点领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高质量的理论成果。二是要密切关注数字化发展对会计财务学科理论体系提出的新挑战。《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会计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会计职能实现拓展升级,切实加快会计审计数字化转型步伐。我们应当主动关注、理解和适应数字经济对传统理论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促进财务和会计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实践中找选题、按学术规范做研究,推动理论联系实际

并解决实际问题,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财务和会计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高大平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相关内容都与财务工作相关,为专家学者研究财务问题、推动财务学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了重要选题。她就做好新时代财务学研究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与财务会计理论相结合,探索重构相应的会计财务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智慧;二是要努力搭建政产学研平台,促进供求对接、资源互通、成果共享;三是要总结提炼反映中国特色发展成果的学术论文,讲好中国故事,彰显全球影响。

中国财政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江湧表示,我们要主动顺应时代召唤,立足中国实践,回应现实需求,加快构建中国式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叶康涛教授表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乃至整个工商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都要做到“三个面向”,即面向实践、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对于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将促进数字化转型作为工商管理学重点发展领域,推动工商管理学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

会议共邀请 11 位专家围绕数字经济、中国式财务管理、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作了主题报告,学者们各抒己

见,共同探讨学术前沿热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增彪教授作了题为《管理会计数字化:从业财融合到跨界关联》的主题报告。他提出,管理会计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信息系统,为企业高层、各级经理和普通员工的计划决策与控制决策提供信息。管理会计的应用和创新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水平,而且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他认为,将“业财融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是发挥管理会计作用的关键所在,但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仅在11%~30%之间。因此,有必要借鉴大数据中“跨界关联”、算法迭代等工具,继续深化“业财融合”,直到触达企业价值创造的动因为止,并由此搭建起“一端为价值(管理会计),一端为价值创造动因,中间为价值创造路径”的逻辑框架,用来指导管理会计与企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王化成教授作了题为《价值网平台组织的社会责任探讨》的报告。他围绕价值网组织的概念、小米公司的网内贡献和水滴公司的社会贡献,从价值创造这个角度来深入分析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面性。他认为,价值网平台企业组织已经成为未来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应当由传统的“单体”模式转向个体、结构和社会的“三层”模式,评价的焦点分别是单体履责表现、网内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和价值网整体的社会贡献。同时,互联网平台组织在社会责任方面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数据可能带来道德问题,互联网产生的垄断问题,数字经济将出现一批新的弱势群体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作了题为《共享中心助力提升财务管理成效——CFO立场与视角》的报告。他提出,共享服务经历了从初级阶段“财务共享中心”(Financial Share's Service Center,简称FSSC)向“共享服务中心”(Share's Service Center,简称SSC)的进阶拓展,后者已经不限于狭义的财务领域。SSC的另一个表达是共享服务平台(Share's Service Platform,简称SSP)。共享服务中心(SSC)是从机构角度来谈的,共享服务平台(SSP)是从功能角度来谈的。共享服务平台主要用于支撑MA报告、实现智能管理。共享服务范围从财务信息向运营信息拓展,将给财务管理以更有力的支持或支撑,让业财融合、业财一体化成为自然,实现初级财务管理向业务型财务、战略型财务的升级,让财务管理真正发挥企业增值功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汤谷良教授作了题为

《构建中国式财务管理体系的思考》的报告。他介绍,目前我国的一些央企积极推进财务管理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建设国际领先的财务管理体系。如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三型三化551”财务体系,坚持“大财务”的方法,通过完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司库管理体系、财务合规风控体系、财务数智体系、财务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等方面内容推动财务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落地。同时他提出,要构建具有“大格局、大财务、大经营、大管理、大数据、大生态”特征的中国式财务管理体系,并提出了管理学为基础理论、实体企业为主体、企业价值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和大数据为基础等11个理论主张。

南京大学商学院李心合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式企业财务理论研究——从跟随者到并跑者》的报告。他认为,第一,中国在国际财务学界扮演的仍然是跟随者的角色,这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中国特色的国情、中国的经济结构不相符。第二,美式财务理论根植于美国的社会基础,其方法论和逻辑前提以美国社会为背景。而我国经济发展具备自身特色,盲目照搬照抄美式财务理论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美式财务理论存在重大逻辑缺陷,如以粗放外延扩张型的投资理论、暗含“高负债扩张陷阱”的融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等。第四,中国财务学界应当坚持从中国实践出发,充分发掘和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企业丰富、独特的财务实践这个“富矿”,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财务问题研究,开展中国式企业财务理论研究,探索构建中国式企业财务理论和方法体系。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特聘院长杨雄胜教授作了题为《正确认识财务资本观 建设体现中国价值的财务理论结构》的报告。他提出,“资本”是现代财务理论最基本与核心的范畴,将目前的金融资本观和西方文化价值观,改造成为满足中国未来财务理论发展需要的社会资本观和中国文化价值观,是当前财务学界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他认为,第一,在现行的金融导向会计观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观下进行学术探讨不具有实质性的探索价值,需将其转变为经济交易导向会计观和可持续发展企业观。第二,中国财务研究只有在认真总结并充分认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至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正确把脉中国发展三位一体,才有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探索并践行体现中国价值的财务理论体系与制度框架结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张新民教授作了题为《企业并购与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他表示,目前或许是建立中国式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当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建立中国式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对西方财务理论进行升华和创新,在企业实践中创建本国的财务管理理论。针对企业并购,他提出,首先,并购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包括财务数据的“做大做强”和高质量发展的“做大做强”。其次,应明确企业并购与企业战略的主体,确定并购的战略属性,明确是全体股东立场还是控股股东或主导治理话语权者的立场。最后,在企业并购与财务可持续问题方面,需要关注高代价收购后的持续经营问题。要明白高代价收购的“线索”不仅是商誉;要明确高代价冲减了谁的权益;应给出高代价收购后财务可持续的合理解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玉德研究员作了题为《以数字化市场化交易助力盘活国有资产》的报告。当前,多因素叠加导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持续低迷,国内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我国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具有较大盘活空间,因此盘活存量资产成为稳经济和缓解收支矛盾的重要抓手。他认为,数字化市场化交易是盘活存量国资的重要方式。数字化交易的便利性有利于提高盘活国有资产的效率和效益,多地依托数字化交易盘活存量资产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推动国有资产数字化市场化面临诸多难点堵点,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化市场化交易制度体系和国有资产数据管理标准体系,鼓励先行先试,加强共治共建,加快构建数字化市场化交易生态和长效机制。

北京工商大学原副校长谢志华教授作了题为《新技术与财务组织转型》的报告。他针对“新技术的发展会使组织架构产生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两个变化”的观点,提出“有限的扁平化”和“多中心化”。第一,组织的本质是通过协同动作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实体组织的背后还存在以信息形式存在的虚拟组织。新技术使得信息处理可以超越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障碍,传统层级组织中的许多层级和环节在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中变得多余,组织扁平化成为必然趋势。但是,组织依然需要最高层的战略来协同所有被扁平化的内部各层级和相关部门,最基本层级和最基本架构仍然会存在。因此,这是有限的扁平化。第二,所谓“去中心化”,实际上是指企业内部平行组织的产生。当企业内每个主体都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时,就具备了自身进行决策和利益考量的可能,能够自适应、自组织、自调整,

形成基于事项(或者需求)的权变的组织架构。平行组织的本质是权力与义务的对等架构,而不是去掉层级,因此企业内部平行组织的出现是“多中心化”的体现,而不是“去中心化”。

山东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国有资本研究院现任院长蔡好东教授作了题为《我对“混改”三种担忧的初步回应》的报告,他就“混改”的三个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针对一些民众对“混改”可能会使国企走上私有化、民营化道路的担忧,他认为,从目标设定和实现路径上看,当下“混改”是公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它既不同于上世纪末我国国企的MBO以及股份合作制主要以存量改革为特征的民营化改造,更与以全盘私有化为目标的原苏联东欧地区国企“改革”模式有着本质区别。第二,针对一些民众对“混改”会不会重走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路的担忧,他认为,当时的“公私合营”是为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而做出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而此轮“混改”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背景下采取的长久之策。第三,针对一些民众对“混改”会不会导致一些重要领域遭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的担忧,他认为,这次混改所遵循的“分类改革”原则充分考虑了国家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而且,我国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资本治理体系正在建立健全,所以这种担忧也是没有必要的。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刘峰教授作了题为《负债的意义》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恒大长期基于负债资本快速扩张的案例,提出负债不只是借钱,还会给管理层带来成功的“幻觉”,继而放大企业的风险。接着,围绕小米因发行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而不得不仓促上市的案例,他提出要思考和研究负债、权益界限模糊的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此外,他认为数字化时代公司财务应该注意两个大趋势:一是数字化企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最主要的产业形态,二是金融化程度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强。因此,在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特征变化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认识负债对企业的意义。

此外,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郭复初教授、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教授、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教授向会议作了视频寄语。郭复初教授提出,未来我们要着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财务活动的特点、规律、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等问题。与此同时,还要特别关注我国传统产业(包括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在进行数字化改造中所产生的新财

务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便充分提高我国财务管理效能,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体系。宋献中教授认为,财会审在数字化战略中的使命担当有:探索数字经济影响企业财会审决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机理机制、重点讨论数字企业与数字化转型企业中的财会审问题、构建数字治理和监管的理论框架、完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充分发挥财会审人员在企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战略方面的作用等。魏明海教授认为,公司财务决策既要算好经济账、数字账,还要算足政治账、质量账,既要算细短账、已账,更要算清长账、众账。

二、推动学术交流,搭建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平行分论坛论文研讨分为两个分会场,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探讨前沿热点,围绕论文进行深入讨论,在学术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一)第一分会场:制度变革与企业财务管理

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对于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研究的文献较少。刘行、陈澈基于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的视角,采用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考察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实际研发加计扣除率为法定标准的67%,影响因素包括税法对于研发支出的认定口径窄于会计准则、税务人员素质、税务部门的放管服改革,以及相关企业层面的特征等。研究还发现,税务部门认定的以及未予认定的研发支出都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但税务部门筛选的研发支出质量更高。点评人朱凯认为,论文采用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考察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运行效率,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一是对政策评估下准定义,分清哪些是政策本身的影响,剔除其他影响。二是高质量研发可能主要来自于会计和税法口径一致的研发投入,需要剔除制度影响之后再测度税务部门认定的影响。三是税务人员的素质水平采用地区的税务人员学历水平以及财税知识水平变量,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可能是地区经济水平以及产业发展水平导致研发投入。

2022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地,增值税留抵退税在企业减负、税收公平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杜亚光、何瑛、郭檬楠和张晓哲通过分析宏微观治理因素,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主要通过“现金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点评人刘行认为,首先,选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内容详实,分析严谨。他建议在理论逻辑上重点关注和分析增值税非对称性的影响。其次,在控制现金流效应的基础上,仍然能够发现显著的结果,这意味着税收非对称性缓解(税收中性)的预期可以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可以按照文章的主逻辑,设计进一步检验的方向,使文章结构和内容更加紧凑。

碳排放治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王艳艳和马梦雨从碳排放和信贷融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自愿披露碳排放信息对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碳排放披露正向影响企业信贷融资;企业的绝对碳排放水平负向影响信贷融资;企业的相对碳排放水平对信贷融资的影响不显著。点评人沈洪涛认为,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微观企业层面碳排放研究的视角非常新颖,企业碳排放披露、碳排放量的数据选取独特。同时,还需要重点考虑如下问题:一是建议关注内生性问题,碳排放披露好、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二是PSM不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三是建议考虑2016年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银行的影响。

2022年初,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司库体系建设成为央企财务管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付必茂、蒋燕、李昉和李卓分析了央企跨国司库体系建设的演进逻辑、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跨国司库体系的建设经验,提出我国央企跨国司库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建议企业在建设跨国司库体系初期要加强顶层设计,充分考虑职能定位、模式选择、资源整合、系统支持、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以确保司库建设目标科学合理、司库功能完备有效、司库运营模式精准适用,最大化发挥司库价值创造效能。点评人戴璐认为,选题具有现实意义,与当前政策结合紧密。建议两个案例应加强对比分析,补充部分文献;同时,文章涉及的司库体系建设,应同组织文化、业务战略、财务战略的定位、组织机制的设计结合分析;在司库运行的功能上,应分析司库体系的作用同企业预算管理、营运资本管理的关系,以及同资金风险管控的关系等;此外,还应应对司库体系的运行效果开展系统评价。

供应链金融不仅具有信贷作用,还具有供应链治理作用。于苏、于小悦和王竹泉以供应链金融的经验证据,研究“链主”如何推动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发

现,“链主”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提升其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全要素生产率,当“链主”议价能力更强、数字化程度更高时该效应更明显。此外,缓解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融资约束以及促进技术升级改造是供应链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点评人江伟认为,文章研究问题新颖,分析严谨。但是需要关注度和数据问题,建议在文献方面与现有大量国内外的商业信用文献衔接;在模式方面,厘清概念,对“链主”企业进行准确度量,说明选择上市公司为“链主”企业的合理性;在实证检验方面,找到更好的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

(二)第二分会场:资本市场、技术创新与公司治理

尹兴强、庞廷云和靳庆鲁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员工持股计划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及其潜在的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有效抑制了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且当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度更大、企业信息不透明程度更高、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以及高学历员工占比更大时,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效果更明显;然而更多的管理层持股与员工参与却并未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进一步研究发现,放松卖空限制或让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则会强化员工持股计划的掏空抑制作用。点评人支晓强认为,论文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且研究过程严谨,建议寻找更加有说服力的指标衡量大股东掏空并进一步厘清员工持股计划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同时加强对基层员工有没有监督大股东掏空的能力、企业为什么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等问题的论述。

纠正债券信用评级机构评级主体错配,有助于改善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较低的现状,厘清债券发行经济主体和法律主体的边界,防范“灰犀牛”风险。苏嘉莉和祝继高通过实证检验,探讨了双重披露能否改善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的问题。研究发现,相比于评级报告只披露合并报表,当评级报告同时披露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时,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越强。同时,当母子公司的主体边界和法律边界越清晰时,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效果就越显著。此外,在评级报告“双重披露制”下,信用评级确实使用了母公司报表的财务信息。点评人吴育辉认为,论文选题很重要,视角很有新意,也具备重要的政策意义。建议将二级市场的信用利差调整为发行时的信用利差,并进一步考虑母公司报表信息增量的影响。此外,建议考虑影响内部资本市场强度的因素,丰富研究指标。

费一洋、曾雪云和黄铮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探讨秀场

直播社群互动机制对主播打赏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品化亲密关系强度的提高能显著提升直播打赏收入。两种模式下头部打赏者打赏比重不同时,其打赏额度的提高会对主播的打赏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主播的个人信息披露能调节商品化亲密关系和头部打赏者占比对直播打赏收入的作用。点评人陈建林认为,论文选题新颖,逻辑严密,研究方法合理,观点明确,格式规范,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应用价值。建议补充说明相关概念和特征,便于读者理解;构建“准社会交往理论—社群交互—打赏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打造“主播—观众”“观众—观众”“主播—主播”三位一体社群交互模式;找出影响“社群交互—打赏收入”的关键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寻找衡量“主播—观众”亲密关系的合适变量,凝练本文的创新之处。

概念炒作一直是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顽疾,很多企业以新技术概念为噱头布局炒作,加剧了债务违约隐患。窦超、李峥和刘巍基于 MD&A 的文本题材信息探讨了企业概念炒作与债务违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概念炒作与发生债务违约事件呈正相关关系;更好的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保护水平以及研发投入能够削弱概念炒作与债务违约的正向关系;概念炒作通过增加关联交易从而引发更多债务违约。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加剧概念炒作与债务违约的关系,且未发现概念炒作行为与发债公司信用评级的显著关系。点评人陈克兢认为,论文选题新颖、思路明确、实证严谨,但是在逻辑链条方面还有待完善。建议寻找到更为直接的机制,调整实证部分结构,同时严格对应机制检验部分与理论分析部分。此外,建议展示本文的热点概念词库,借助交易所对涉嫌“蹭热度”“炒概念”公司的关注和问询来验证变量的精准性,采用 LDA 主题模型等提高结论可信度。

罗勇根、田娜和王得力基于 ESG 评级的经验证据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提高 ESG 评级,且在高污染企业以及具有 IT 背景高管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高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及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三方面提升企业 ESG 评级。点评人沈红波认为,论文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但角度微观,建议思考宏观层面的意义。同时,建议考虑 ESG 不同的维度,对比不同的 ESG 评分渠道或者考虑评分的变化。此外,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词,建议根据数字化转型前后的情况研究动态的差分模型,增强研究的可信度。